

浅析明代皇室礼服的因革

梁曼容, 李昀涵

(延安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以明代皇室成员的礼服为例,从服饰的调整内容、礼制内涵,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出发,通过分析洪武、永乐、嘉靖3个时期的礼服因革,总结出明代礼服的特点是复唐宋之风、明等级尊卑、集家国一体、齐夫妇对应。认为服饰制度是明朝政府对皇室成员进行区分、管理与控制的工具之一。

关键词: 明代; 皇室; 服饰; 礼服; 因革

中图分类号: K 892.23; TS 941.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1928(2023)03-0235-07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yal Dress in Ming Dynasty

LIANG Manrong, LI Yunh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Yan'an University, Yan'an 716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took Ming Dynasty royal family members' dresses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yal dress in Hongwu, Yongle, Jiajing periods from the contents and ritual connotation of the dress adjustment,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en it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ng Dynasty dress: restoring the style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larifying the rank and hierarchy, integrating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matching the couple.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costume system was one of the tools used by Ming Dynasty government to distinguish, manage, and control royal family member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royal family, costume, dress, transformation

古代服饰制度作为国家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着王朝的政治思想。学界关于明代服饰的研究包括服饰制度^[1]、舆服志^[2]、特定人群服饰^[3]、服色^[4]、古代少数民族服饰^[5]、服饰与考古^[6]、服饰文化^[7]等方面。虽然上述研究对明代礼服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但缺乏对皇室礼服制度及其因革的详细考察。明朝服饰制度与政治文化紧密相关,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和尊卑界限,这一点在皇室成员的服饰上尤为明显。

王熹^[1]将明代服饰分为礼服和便服。男性成员的礼服包括衮冕、皮弁服、武弁服和通天冠等,但武弁服和通天冠只限于皇帝使用,皮弁服的使用场合限于“朔望视朝、降诏、降香”等^[8],这3种礼服无论是适用人群的广泛程度,还是使用场合的隆重程度均不及衮冕。相比而言,女性服饰较为简单,仅

有礼服和常服之分。因此,文中研究的“礼服”特指皇室男性的衮冕与女性的礼服。

同时,为更直观地论述礼服因革及其体现的政治意图,文中的“皇室”特指皇帝与皇后、皇太子及皇太子妃、亲王及亲王妃、亲王世子及世子妃、郡王及郡王妃。文中通过研究洪武、永乐、嘉靖3个时期皇室成员礼服制度的变化,探究其变化的内容、原因和其中所体现的礼仪秩序与内涵。

1 男性衮冕的因革

《周礼·春官·司服》中记载:“王之吉服,祭昊天上帝,则服大裘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服衮冕。享先公飨射,鹭冕。祀四望山川,毳冕。祭礼稷五祀,希冕。祭群小祀,玄冕。”^[9]无论是祭祀

收稿日期:2022-05-29; 修订日期:2022-12-15。

基金项目:韩国教育部、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韩国学振兴事业团)“海外韩国学孵化型”项目(AKS-2021-INC-2230001)。

作者简介:梁曼容(1983—),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Email:ruoshuiruoxin@163.com

天神、地祇、山川，还是人鬼，冕服在各种礼仪场合均作为君主的着装出现，可见冕服在国家礼制中的重要性。

纵观明朝的服饰因革，从洪武时期朱元璋初创袞冕，初步恢复华夏礼仪，划分皇室内部尊卑，至永乐时期朱棣借袞冕推行缓和政治氛围的亲亲之谊，再到明末嘉靖帝独尊袞冕，这 3 个时期君王的做法都有其各自的背景和意图。袞冕作为明朝最重要、最正式的冠服，其制度的重建与发展，以及细节上的调整，是当时统治者政治意图与社会环境的体现，也象征着君臣、父子间的尊卑与亲疏。

1.1 洪武时期的冕服制度

洪武元年(1368 年)二月，朱元璋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认为“胡俗变易中国之制”^[8]，极力主张“复古”，即恢复唐朝服制，并以华夏族的共同文化为依托，重建礼仪制度。美国著名明史研究者范德将朱元璋一系列强调华夷有别、恢复唐宋之制的做法称为“准民族主义”^[10]，认为朱元璋是站在汉族人民推翻蒙古人压迫统治的民族立场上设立的服饰制度，体现出“严夷夏之防”的特殊性。

同时，朱元璋对恢复唐制的政策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①他以百姓对使用胡服、胡姓、胡语感到“久厌之”为由，下令“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士庶则服四带巾”^[8]，按照唐制初步

确立简单的服制；②朱元璋规定“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辮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8]，从多个方面禁止胡俗。由此可知，洪武时期服制重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取法唐宋”，这一方式在袞冕的重建中也可见一斑。

洪武元年(1368 年)二月，翰林学士陶安请制冕服，被朱元璋拒绝：“五冕礼太繁。今祭天地、宗庙则服袞冕，社稷等祀则服通天冠、绛纱袍，余不用。”^[8]因此，明朝只有袞冕，袞冕制度雏形初现。同年十一月，在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时，朱元璋命礼官“稽考古制”^[8]，在参考了从虞至宋的袞冕形制后，规定了本朝的袞冕服制。图 1^[8]为明初亲王的冕冠。至此，皇帝、皇太子和亲王 3 级袞冕初步确立，袞冕形制以及各等级间的差别见表 1^[8]。



图 1 山东博物馆藏鲁荒王朱檀墓出土明初亲王冕冠
Fig. 1 Prince crown of early Ming Dynasty in Shandong Museum, unearthed from King Luhuang ZHU Tan Tomb

表 1 洪武元年的袞冕形制
Tab.1 Crown costume system in the first year of Hongwu

构件	形制		
	皇帝	皇太子	亲王
冕	冕板广一尺二寸(约 40 cm),长二尺四寸(约 80 cm),冠上有覆,玄表朱里		
旒	十二旒,每旒五彩十二玉	九旒,每旒五彩九玉	九旒,每旒五彩九玉
衣、裳颜色	玄衣、纁裳	玄衣、纁裳	青衣、纁裳
圭	圭长一尺二寸(约 40 cm)	长九寸五分(约 32 cm)	长九寸二分五厘(约 31 cm)
章纹数	十二章	九章	同皇太子
上衣章纹	衣六章,画日、月、星辰、山、龙、华虫	衣五章,画山、龙、华虫、火、宗彝	同皇太子
下裳章纹	裳六章,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裳四章,绣藻、粉米、黼、黻	同皇太子
中单	以素纱为主	白纱中单	同皇太子
蔽膝	绣龙、火、山三章	绣火、山二章	同皇太子
革带	玉	金钩燹	同皇太子
袜履	朱袜赤舄	白袜赤舄	同皇太子

初创时期的袞冕制度只涉及皇帝与皇子两代人,其他宗室并无服冕资格,且由表 1 可以看出,太子的袞冕与其余诸子之间的区别并不大。明朝这种做法不仅将皇室与群臣、百姓之间进行严格区分,同时还拉近了皇室内部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

强化“家天下”的观念。

此外,明朝有向外国(如高丽、李氏朝鲜)藩王赐袞冕的特例。《明太祖实录》^[8]记载:洪武三年(1370 年)八月“高丽遣其三司使姜德赞上表谢赐袞冕”,可知这时高丽已经拥有了袞冕。李氏朝鲜于洪武二十

五年(1392年)建立,虽然朱元璋对李氏朝鲜数次请赐服饰、要求改易大明风俗与制度、求赐国名的做法多有不满,但最终还是赐其衮冕,由此可以看出大明对李氏朝鲜的认可,体现了统治者的政治意图。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六月,朝廷对皇帝的衮冕服制进行了部分修改,主要包括3点:①冕上五彩纁的设计更为精致;②裳和蔽膝的颜色改为黄;③朱袜赤舄改为黄袜黄舄,并添加金饰^[8]。这些改动明显强调了皇帝与诸子之间的区别,更加彰显了皇帝的独尊与至高无上。此后,朱元璋虽然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二十六年(1393年)对冕服又进行了两次细微的调整,但主要集中在冕服图案织就工艺上,冕服制度并无较大变化。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明王朝赋予亲王世子服冕的资格,并对其形制与使用范围进行规定:“衮冕各七章……凡遇天寿、圣节……世子衮冕,随班行礼。”^[8]至此,皇室内部拥有服冕资格的人延伸到了第三代,皇室等级秩序更加规范,家族成员之间的情谊也进一步加深。

洪武时期,朝廷在“取法唐宋”的思想下对衮冕

服制进行初创与完善,不仅确立了衮冕的形制,更确定了大明服冕资格的人群范围,初步明确家族内部君与臣、父与子的界限,皇权的独尊与皇室内部的亲疏关系大致确定。同时,朝廷将皇室与群臣进行区分,皇室成员在各种典礼和盛大场合上着衮冕,直观展现了皇室一体的形象。

1.2 永乐时期的冕服制度

永乐三年(1405年),明王朝对服饰制度又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次调整的最大变化就是具有服冕资格的人群被扩大。明成祖将郡王纳入了服冕体系,同时还将亲王世子的衮冕提升为和亲王一样等级,均为八旒。调整后,郡王的衮冕形制为:“冕缁……前后各七旒……袜舄皆赤色。”^[11]可以看出,郡王的衮冕与亲王、亲王世子的形制差别较大,等级也较低。朱棣在进一步完善、界定皇族内部尊卑秩序的同时,广泛推行“隆亲亲之恩”的政策,以巩固皇权,重申“家天下”观念,形成了由皇帝、皇太子与亲王、世子、郡王构成的4级服饰序列,具体构件差别见表2^[11]。湖北博物馆馆藏梁庄王朱瞻垿墓出土亲王冕冠如图2所示。

表2 永乐年间的衮冕形制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the crown costum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od

构件	形制				
	皇帝	皇太子	亲王	亲王世子	郡王
冕、旒	前后各十二旒,每旒五彩玉珠十二	前后各九旒,每旒五彩纁九就,贯五彩玉九	同皇太子	前后各八旒,每旒五彩纁八就,贯五彩玉八	前后各七旒,每旒五彩纁七就,贯五彩玉七
衣、裳颜色	玄衣、纁裳	同皇帝	青衣,纁裳	同亲王	同亲王世子
上衣章纹	衣八章,画日、月、龙、星辰、山、火、华虫、宗彝	衣五章,画山、火、龙、华虫、宗彝	同皇太子	衣三章,火、华虫、宗彝	衣三章,粉米、藻、宗彝
下裳章纹	裳四章	同皇帝	同皇太子	同亲王	裳二章,绣黼、黻
中单	素纱中单	同皇帝	同皇太子	同亲王	同亲王世子
蔽膝	绣藻、粉米、黼、黻各二,四章	同皇帝	同皇太子	同亲王	绣黼、黻各二,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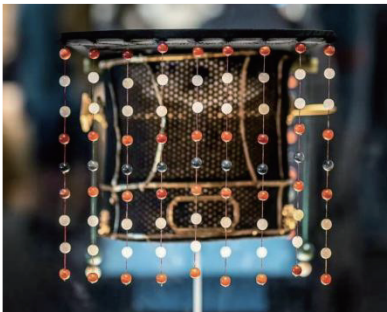


图2 湖北博物馆馆藏梁庄王朱瞻垿墓出土亲王冕冠
Fig.2 Prince crown in Hubei Museum, unearthed from King Liangzhuang ZHU Zhanji Tomb

由表2可以看出,此次调整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皇帝与诸子、皇太子与亲王之间的衮冕差别变小,亲王世子与郡王之间的差别却较为明显。例如,在章纹上,皇帝至亲王世子的裳、蔽膝均为四章,而郡王为二章。此次调整一改洪武年间突出皇帝衮冕独尊地位的做法,不同等级衮冕之间增加了相同的章纹与元素,淡化了皇帝与诸子的区别;同时,亲王世子与郡王衮冕的差别则意在规范皇室内部的秩序与尊卑,亲王世子是未来的亲王,地位上高于郡王,因此,哪怕郡王和亲王世子是同辈,他们的衮冕形制也低于亲王世子。

永乐时期冕服制度调整的根本原因在于,皇室内部叔夺侄帝位的“靖难之役”过去不久,人们对于朱棣继位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质疑还未消除。此外,朱棣在起兵时曾以“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磐石之安”来反对建文帝^[12],证明自己发动“靖难”的正当性,因此朱棣“即位以后就履行他拨乱反正的誓言……恢复了被建文帝所违背的祖宗制度。这些行为无疑证明了永乐帝取得权利的合法性。”^[13]

表 3 永乐三年与嘉靖八年皇帝衮冕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imperial crown between the third year of Yongle and the eighth year of Jiajing		
构件	形制	
	永乐三年	嘉靖八年
冕、旒	玄表朱里,前后各十二旒,每旒五彩玉珠十二	冠板长二尺四寸(约80 cm),广二尺二寸(约73 cm),玄表朱里,前后各七彩玉珠十二旒,玉珩玉簪导,朱纓青纁充耳,缀以玉珠二
衣、裳颜色	玄衣、纁裳	玄衣、黄裳
上衣章纹	衣八章,画日、月、龙、星辰、山、火、华虫、宗彝	衣六章,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
下裳章纹	裳四章,绣藻、粉米、黼、黻	裳六章,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中单	素纱中单	中单素纱为之,青缘领,织黼纹十二
蔽膝	随裳色,绣藻、粉米、黼、黻各二	随裳色,上绣龙一,下绣火三
大带	大带素表朱里,两边用缘,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素组	大带素表朱里,上朱下绿,不用锦
佩、绶	大绶六彩,小绶三色,同大绶间施三玉环	大绶六彩,小绶三色,间施三玉环
袜履	袜舄皆赤色	朱袜赤舄

韩国学者崔圭顺将嘉靖帝对衮冕的调整总结为:“冕冠采用永乐三年之制,衣裳采用洪武年间之制。”^[15]这是嘉靖帝以“衣常掩裳……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为由调整的结果^[14],即衣、裳的章纹和颜色恢复洪武旧制,而冕冠则依旧沿用永乐年间的制度。嘉靖帝一方面强调恢复太祖祖制,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借衮冕的调整,提升皇帝衮冕(尤其是冕冠)形制的规格。

由表 3 可知,嘉靖朝的冕冠规格远高于永乐三年的规定,这也是此次调整的最大特点。嘉靖朝的冕板长二尺四寸(约 80 cm),广二尺二寸(约 73 cm),远超以前长二尺四寸(约 80 cm)、广一尺二寸(约 40 cm)的规格;冕版上的旒采用七彩玉珠,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形象。这些修订与嘉靖皇帝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关。嘉靖皇帝以外藩继承大统,刚继位就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礼部大臣发生“大礼议之争”,在与官僚集团的数次斗争中,嘉靖皇帝逐渐把握朝政,并培养起了自己的亲信,取得了绝对的皇权。因此,嘉靖帝急需向大臣和百姓彰显自己的权力,而服饰自然就是最直接的体现。

此外,明世宗之所以围绕皇帝衮冕进行调整,而较少涉及其他皇室成员衮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应对服制僭越的问题。明中后期,服饰的奢

1.3 嘉靖时期的冕服制度

嘉靖八年(1529 年),世宗朱厚熜对衮冕服制进行一系列更定,他提出“冕弁之制未合典制”的疑问,以“阙革带,则礼服不备;非斋明盛服,以承祭祀”为理由^[14],再次对衮冕服制进行了调整。此次调整虽然也涉及地方宗室,但主要围绕皇帝衮冕形制展开。永乐三年与嘉靖八年皇帝衮冕对比见表 3^[11,14]。

靡与僭越渐成风气,甚至成为一种全国性现象^[16],再无明初期的朴素之气。为此,朝廷颁布了数条服饰禁令,其中也涉及同样拥有服冕资格的地方宗藩。

嘉靖五年(1526 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席书等人上书,指出宗藩冠服“劳费不可胜言……令其自行造办”^[14],但“自行造办”又会使得冠服不可避免地出现违禁、僭越,使服制的等级性、稳定性受到冲击。因此,嘉靖九年(1530 年),礼部又提出了折中之举:“自郡王而上,冕冠……各仍旧无议矣。惟青衣裳系应禁之物……须奏请颁给。而玉带、玉环、玉佩听自为之。其长子而下……更改嗣后定以为式。”^[14]即针对服饰僭越问题,礼部对郡王以上和郡王长子以下的人群,分别提出了“奏请颁给”和“定以为式”两种措施,此建议后被朝廷采纳。可见当时国家财政紧张,宗藩人口众多,且服饰僭越情况严重,因而对不同爵秩宗室的服饰构件提出了不同的管理办法。

嘉靖改制全由皇帝本人发起,本人决定,他不仅调整了皇帝已有冠服,使之更加华丽复杂,还开创了新的服制,如皇帝燕弁服、品官忠靖服、保和冠服等,并将保和冠服赐给宗藩^[17]。这次调整主要侧重于皇帝自己的服制,是其凸显皇权、与官僚集团

斗争的方式之一。

2 女性礼服的因革

女性成员的冠服形制只有两种,燕居时穿着的常服和受册、谒庙、朝会等比较庄重场合穿着的礼服^[18]。整体而言,女性礼服的调整次数少、幅度小,且与男性成员袞冕的调整呼应,同时对应了不同的等级尊卑,更体现着古代女性以夫为纲的准则。洪武、永乐时期是女性礼服调整的主要时期,永乐三

年(1405 年)的调整结果更是沿用至明末。

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诏定冠服之制”,规定皇后以祔衣、九龙四凤冠作为礼服;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对冠服制度进行了修改,定皇后礼服为翟衣、九龙四凤冠^[17];永乐三年(1405 年),朝廷对皇后礼服进行了再次更定。洪武时期与永乐时期皇后礼服的对比见表 4^[18]。由表 4 可以看出,永乐时期改制后的皇后礼服构件繁复完整且精致华丽(见图 3),并与皇帝袞冕遥相呼应。

表 4 洪武、永乐时期皇后礼服的对比

Tab. 4 Comparison of empress dresses in Hongwu and Yongle period

构件	形制	
	洪武时期	永乐时期
冠	冠为圆国,冒以翡翠,上饰九龙四凤,大花十二树,小花如之,两博鬓,十二钿	九龙四凤冠,冒以翡翠,上饰翠龙九,金凤四,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十二树,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三博鬓,饰以金龙、翠云,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上饰珠宝钿花十二,翠钿如其数;托里金口圈一副,珠翠面花五事;珠排环一对,皂罗额子一,描金龙纹,用珠二十一颗
衣	祔衣,深青为质,画翠,赤质,五色十二等	翟衣,深青为质,织翟纹十二等,织金云龙纹
中单	素纱中单,黼领,朱罗縠褙裾	玉色纱为之,红领褙裾,领织黻纹十三
蔽膝	随衣色,以缟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	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缟为领缘,织金云龙纹;纁丝、纱、罗随用
大带	大带随衣色,朱里纁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玉革带	大带,表里俱青……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纁五彩,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背织成;小纁三色,同大纁;玉佩二
圭		玉谷圭,长七寸(约 23 cm)
袜履	青袜舄,舄以金饰	青袜舄,袜以青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龙纹,每舄首加珠五颗



图 3 故宫博物院藏明神宗定陵出土孝靖皇后凤冠
Fig. 3 Phoenix crown of Empress Xiaojing in Palace Museum, unearthed from Ming Shenzong Ding Mausoleum

皇太子妃的礼服也作出了相应的调整。洪武时期,朝廷规定皇太子妃与皇妃的礼服都为翟衣。但到了永乐年间,这种一致被打破,皇太子妃礼服仍为翟衣,与皇后相同;皇妃则不再穿翟衣、用凤纹,而是把常服的大衫霞帔升级为礼服,比皇太子

妃降一等^[17]。由此看出,皇太子妃的礼服形制已经越过皇妃,向皇后看齐。皇太子妃地位的提高,是永乐朝进一步完善“家天下”制度、强化等级尊卑的措施。亲王妃礼服冠也由洪武年间的凤冠变为永乐年间的九翟冠,形制与皇妃相同(见图 4)。



图 4 江西博物馆藏明益宣王朱翊鉞元妃李氏墓出土九翟冠
Fig. 4 Nine di crown in Jiangxi Museum, unearthed from Tomb of LI, the concubine of Ming Yixuan King ZHU Yiyin

世子妃和郡王妃的礼服在永乐时期才有定制，均与亲王妃相同，唯独冠用七翟，且郡王妃礼服为“绣云霞翟纹，不用盘凤纹”^[17]。之所以洪武时朝廷没有规定郡王妃的礼服形制，是因为当时未将郡王纳入衮冕体系。同时，郡王妃的礼服在形制上与亲王妃、亲王世子妃区别明显，也与郡王的衮冕等级低于亲王、亲王世子相呼应，体现了明朝服饰尊卑有别的严格性与夫妇对应的一致性。洪武、永乐

时期女性礼服形制对比见表 5^[18]。

霞帔也是区别尊卑的主要服饰构件，其纹饰以及末端的坠头是区别不同身份人群的标志。在霞帔纹饰上，明制规定只有皇后才能用龙纹，皇妃至亲王世子妃只可用凤纹，郡王妃则用翟纹。除此之外，霞帔坠头的材质和纹饰也有相关规定，如皇后、皇妃、太子妃用玉，亲王妃、亲王世子妃、郡王妃则用金；坠头的纹饰与霞帔上的纹饰一致^[19]。

表 5 洪武、永乐时期女性礼服形制对比

Tab. 5 Comparison of female dresses in Hongwu and Yongle periods

时期	形制					
	皇后	皇妃	皇太子妃	亲王妃	亲王世子妃	郡王妃
洪武时期	九龙四凤冠，衤衣深青	九翟四凤冠，翟衣青质	与皇妃同	九翟四凤冠		
永乐时期	翠龙九金凤四，翟衣深青	九翟冠，大衫、霞帔……俱云霞凤纹	九翟四凤冠，翟衣青质	九翟冠，制同皇妃	与亲王妃同，惟冠用七翟	与亲王世子妃同，冠用七翟，大衫霞帔……绣云霞翟纹

3 礼服更定所体现的“礼”与明代政治文化

明太祖、成祖和世宗对礼服的更定，不仅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朝廷治理国家的政治思路与意图。

3.1 复唐宋之风

作为明朝的开国帝王，朱元璋尤其重视华夏典章制度的重建。他要求消除元朝风俗对中原的影响，并从华夷观念出发，强调恢复中华衣冠，禁止一切胡俗，同时以唐宋为标准，强调“稽古立制”的服制原则。例如，《明太祖实录》^[8]记载，朱元璋在历朝历代衮冕形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才最终确定明朝的衮冕形制，体现了明朝礼服以唐宋为榜样，力求回归华夏服制的特点。

3.2 明等级尊卑

皇室礼服的制度具有明确的等级尊卑观念。例如，泰昌元年（1620 年）官修的《礼部志稿》^[11]以皇帝、皇后、皇太子、皇太子妃、亲王、亲王妃等顺序进行书写；服饰具体形制的规定也等级分明，在地方宗室的衮冕形制上尤为明显，如亲王世子与郡王服饰中，裳和蔽膝的章纹有所差别，郡王为黼、黻两章，而郡王以上皇室成员为藻、粉米、黼、黻四章。同时，郡王及以上的宗室服衮冕，而郡王长子及以下的宗室服朝服、梁冠。此外，嘉靖时期，针对宗藩冠服僭越与违禁的问题，朝廷根据服衮冕和服朝服、梁冠的不同人群，提出了各自解决方法。这样的做法避免了因礼服调整影响皇室秩序与皇权威

严，同时也起到安抚、拉拢地方藩府和辨别不同爵秩人群尊卑的作用。

3.3 集家国一体

明朝的 3 次衣冠更定涉及多种服饰，不同服饰有不同的穿着场合，也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皇室成员的服饰更是如此。如果说礼服是皇室成员出现在大众面前的标志性服饰，代表着国家形象，那么常服则象征着皇室成员之间的家人身份，少了君臣本分，多了亲人之情。例如，《明实录》中记载了亲王见东宫的礼仪：“凡亲王来朝，具衮冕见天子，毕，次见东宫。”^[8]此时东宫也需穿衮冕、执大圭，亲王在礼官的引导下拜见完东宫后，东宫与亲王才可换常服，到后殿行家人礼。由衮冕与常服的穿着顺序可以看出先君臣后家人的纲常。

但这条规定在朱标去世之后，进行了更定。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由于“诸王皆东宫叔父”，朱允炆虽为继承人，却是晚辈，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重新规定，诸王见天子礼更加隆重：“具冕服，叙君臣礼，行五拜三叩头……衣常服，叙家人礼。”^[20]此时，叙君臣礼、叙家人礼的规定更加详细，特别是规定了东宫与诸王的地位。这样的做法既严格区分君臣，抬高朱允炆的地位，也安抚诸王，防止其以长辈自居不敬太子。

3.4 齐夫妇对应

明朝格外注重服饰上的夫妇对应，主要表现在服饰形制上。例如，洪武时期之所以没有规定郡王妃的礼服形制，是因为郡王未被纳入衮冕体系；在

永乐改制后,郡王被纳入服冕体系,朝廷也对应确立了郡王妃的礼服。同时,为了与郡王和亲王世子衮冕之间的差别相对应,郡王妃的礼服也与亲王世子妃有所区别,即大衫霞帔只能绣翟纹,不能用凤纹。再如,皇帝衮冕绣有十二章纹,皇后首饰就有大小花树各十二、钿数十二;皇太子衮冕绣有九章纹,皇太子妃首饰就有大小花树各九、钿数九^[18]。

夫妇对应除了体现在具体服饰形制上,也体现在史书的书写中。例如,《礼部志稿》按照夫妇对应的顺序记录服饰,同时还将每类服饰按照重要性排序,即先衮冕、礼服,后常服,形成了整体上夫妇对应,细节上等级分明的书写原则。

4 结 语

历朝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改正朔,易服色”,可见服饰在国家礼仪秩序重建中占据重要地位。洪武时期,朱元璋确立明朝的服饰制度,并以唐宋为榜样,在恢复古制的基础上对礼服进行更定,以求达到“辨贵贱,明等威”、恢复被胡俗破坏的华夏礼乐制度的目的。永乐时期,朱棣在延续旧制的同时,通过扩大穿着礼服的人群范围来推行“亲亲之恩”,即将郡王与郡王妃纳入礼服体系,表明其对宗藩的重视。朱棣在位时继续推行太祖的各项政策,以证明其继位的合法性。嘉靖时期,国家财政亏空、宗藩人口增加以及社会风气差等多重因素导致服饰僭越现象愈发严重;而朱厚熜又“以藩王入继”,所以这一时期的冕服调整主要集中于皇帝,且衮冕的华丽程度前所未有。

由此可见,服饰制度与政治文化紧密相关,它不仅体现了皇室内部的等级尊卑,还展现出社会风气对皇室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君主治理国家的思想,是君王彰显统治权力的手段,因而历代君主均对它极其重视。

参考文献:

[1] 王熹. 明代服饰研究[M]. 北京:中国书店,2013.
[2] 李小虎.《明史·舆服志》中的服饰制度研究[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9.
[3] 王熹. 明代官员服饰研究[J]. 故宫学刊,2008,5(1):

180-216.
WANG Xi. A study of Ming Dynasty official [J].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2008,5(1):180-216. (in Chinese)
[4] 苏文灏.“禁忌与突破”——明代服饰色彩文化释析[C]//2020 中国色彩学术论文集(入选论文篇). 北京:中国流行色协会,2020:155-163.
[5] 王熹. 明代少数民族与藩属国赐服述论[J]. 故宫学刊,2009,6(1):96-142.
WANG Xi. On Ming Dynasty robe bestowal on ethnic minorities and vassal states [J].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2009,6(1):96-142. (in Chinese)
[6] 李昕. 七十年来明代墓葬出土服饰研究回顾与展望[J]. 中国史研究动态,2021(1):27-35.
LI Xin. Review and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costumes excavated from Ming Dynasty tombs in the past seventy years[J]. Trends of Recent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2021(1):27-35. (in Chinese)
[7] 张志云. 明代服饰文化研究[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8] 佚名. 明太祖实录[M].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9]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 范德,姜永琳. 朱元璋与中国文化的复兴——明朝皇权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C]//第5 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明史学会第3 届年会论文集. 西安:中国明史学会,1993:382.
[11] 林尧俞,俞汝楫. 礼部志稿[M].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2] 佚名. 明太宗实录[M].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3] 牟复礼,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M]. 张书生,黄沫,杨品泉,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4] 佚名. 明世宗实录[M].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5] 崔圭顺. 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M].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
[16] 傅衣凌. 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17] 朱勤溪. 王国典礼[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8] 申时行. 明会典[M]. 万历朝重修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9.
[19] 张廷玉. 明史·舆服制:2[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0] 张德信,毛佩琦. 洪武御制全书[M]. 合肥:黄山书社,1995.

(责任编辑:沈天琦)